

做伦理学: 《千与千寻》与伦理学

张 曦

【摘 要】动漫因其独特的技术能力而成为有关“美好生活之道”的重要沉思方式。《千与千寻》是宫崎骏作品中思想极为厚重复杂的一部。以《千与千寻》为例开展分析,将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做伦理学”方法论是如何实现哲学伦理学素材库的拓展的。这种拓展将为哲学伦理学研究带来全新的质地感,从而使我们更加明晰地理解某些对人类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伦理知识。

【关键词】做伦理学 《千与千寻》 成长 现代性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82

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学方法论,我们提出“做伦理学”口号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拓展哲学伦理学研究的素材库,使得所有围绕“美好生活之道”产生的人类知识和经验,不管在载体形式方面有何种差异,都有机会被纳入哲学伦理学研究的视域,成为严肃学理研究的可靠对象材料。

我们相信,对于人类存在者来说,有多少思想表达技术,就有多少种记载了人类伦理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文化载体形式。在这一点上,动漫与文字、静态图像、建筑、园林、物质遗迹等并无不同,而且它因其独特的技术能力,无疑也是人类沉思“美好生活之道”的重要方式。动漫作品,尤其是像宫崎骏(Miyazaki Hayao)的《千与千寻》这样的动漫作品,值得我们以一种非常严肃的学术态度去加以研究。本文即以《千与千寻》为范例,来具体展示“做伦理学”这一方法论是如何得到运用的。

—

宫崎骏的作品向来长盛不衰,其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纳斯鲍姆曾对宫崎骏作品的特点有一个概括。她说,宫崎骏的动漫“创造了一个充满温文尔雅、意图良善的人的世界,在那样一个世界中,没有人是必须受到惩罚的恶棍(villain)”^①。的确如此,从人物和情节的刻画上看,宫崎骏的动漫作品,往往将社会-历史条件和既有生存处境当作一种给定条件,把个体视为被抛掷在由各种各样外在于自己控制的、或好或坏的偶然性因素所组成的世界之中,通过对故事线索的精巧刻画和周密推进,最终揭示出个体如何在偶然性因素的裹挟下重建自我、获得成长。

^① <https://www.law.uchicago.edu/news/philosophy-service-humanity-excerpt-martha-c-nussbaums-kyoto-prize-commemorative-lecture>.

宫崎骏特别注意通过细腻刻画角色如何“行动 (action)”和“选择 (choice)”，来揭示出在现实世界中不难找到相应映射的人类激情 (passion)、热望 (aspiration) 和品格 (character) 模式 (或者说人性的表达模式)。特别是，在他的作品中，主要角色的品格特征 (traits of character) 与身处环境的总体“精神气质 (ethos)”之间构成某种互动关系。主要角色的品格特征，不是被刻板设定、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某种不断被塑造、不断被养成的状态之中。正是在对主要角色的品格特征与环境的“精神气质”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刻画中，“主要角色如何实现自身能动性 (agency) 或主体性 (subjectivity) 的扩充与重建”这个问题，就成为了宫崎骏动画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也正因此，宫崎骏的作品实际上是围绕着主要角色的“精神成长 (spiritual improvement)”之道而展开的一系列思想探寻。这些思想探寻始终以“人类品格”为中心，从而很容易呼应一种以“美德”为中心的伦理探寻企划。^①

《千与千寻》是宫崎骏作品中思想极为厚重复杂的一部。故事的情节背景，设定为一个由神祇、魔法和奇遇组成的奇幻世界。在这个充满风险和困难的世界里，为了将因为贪吃而变成猪的父母救出猪圈，一个叫作荻野千寻的女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多样的人类关系，从一个瘦小懦弱、百无聊赖、无精打采的青春少女 (the shōjo)，最终成长为独立自信、充满勇气、在个性和道德两个方面都更加成熟的少女英雄 (heroine)。这部作品的创作意图，用宫崎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试图刻画一个有关成长和冒险的故事。“这个故事无关‘对’与‘错’。它是一位少女英雄被抛掷进一个‘好’与‘坏’相交织的世界、并且经验这个世界的故事。”^② 在这个世界里，千寻的任务并不是要作出“道德判断”，不是要去战胜什么、摧毁什么、赢得什么，而是要获得一种内在的能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就像宫崎骏自己说的那样，千寻“之所以能够变成一位少女英雄，并非因为她容貌俊美或才智不凡”。相反，千寻普普通通、毫无出奇之处。然而，这一点“恰恰是整个作品的关键所在，从而使得《千与千寻》对所有年轻女孩来说都是一个好故事”^③。

故事一开始，由于千寻父母莽撞的决策力、躁动的好奇心和对现代信用制度的迷信与滥用，千寻一家卷入了神灵世界的命运之中。在那个奇幻世界里，千寻的行动和选择，大多数时候都发生在一个叫作“油屋”的地方。“油屋”是一个供各路神灵享受的洗浴之所，神灵们在其中以消费的方式获得所需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油屋”是这个奇幻世界里的商业之都。正是作为商业之都，“油屋”同时也就成了一个“和平之家”。它能克服由人类的自然激情而生发的各种冲突，驯化各路神灵的不同欲望，将一切人类欲望和态度都收敛到消费和财富积累活动上来。^④

进一步留意，我们还会发现，“油屋”非常特别。从外观样式看，它色彩明艳、建筑复杂。无论是外部结构，还是内部陈设，都充满日式风格，带有强烈的民族性。从内部管理看，它遵循了现代商业组织的科层化管理架构，治理权力层层传导，员工职责划分明确。但与此同时，“油屋”又别具一格地体现出某种“集体性”特征，在现代商业组织中杂糅了带有鲜明民族性的日式人际关

① 对类似作品的类似处理，我们在麦金泰尔《追寻美德》一书中很容易看到。比如说，麦金泰尔将简·奥斯汀的小说视为“美德”观念变迁史上的一个重要标本。通过对奥斯汀小说的探索，麦金泰尔揭示了“恒久性 (constancy)”是如何成为西方“美德”观念的一个内容成分的。参见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8, p. 183。

②③ Miyazaki Hayao, “Chihiro in a Strange World: The Aim of This Film”, *The Art of Spirited Away*, Studio Ghibi, 2001, pp. 12—15, p. 12.

④ 参见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油屋”对待不速之客“河神”的态度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系特色。这就使得“油屋”中充满了矛盾，它既遵循商业资本逻辑，致力于财富增殖，又在方方面面具有某种民族性和传统“精神气质”。“油屋”时刻提醒着我们，那个奇幻世界与我们所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一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商业资本与文化精神之间的矛盾。

正是由于共享并熟悉我们称之为“现代性(modernity)”的那样一种生活形式，一个有着恰当敏感性的观众会充分意识到，宫崎骏所试图捕捉的其实是一个事关人类总体命运的重大课题：在现代资本横冲直撞之下，曾经所熟悉的、以“传统”之名所体现的那些“美好生活”之道，究竟何去何从？失去了“坐落(unsituated)”的现代人，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前景？在这个困惑面前，宫崎骏摆出了三条出路，以刻画三个角色的方式呈现出来。

第一条出路是“成为汤婆婆”。汤婆婆是“油屋”的主人，她热衷于挣钱。挣钱这一行为当然古已有之，因为贸易活动和商业行为古已有之。但汤婆婆的挣钱活动，具有“现代商业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性质。汤婆婆之所以是一个现代商业资本家，她的挣钱活动之所以是资本增殖行为，原因就在于汤婆婆的经营行为除了利润之外没有其他目标。单纯追逐利润，并且追逐最大化的利润，使得汤婆婆本身成了资本的化身。资本的目标就是汤婆婆的生活目标。于是，汤婆婆以契约的方式购买和支配劳动力。对所有不愿工作、也就是不愿出卖劳动力的闯入者，汤婆婆只有一个解决之道：吃掉。对于愿意签订契约、出卖劳动力的人，她索取姓名。姓名是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世界的印记，它告诉人来自何处、归属何方。褫夺一个人的姓名，本质上就是要使人丧失他的身份，即被无名化、原子化，变得无牵无绊(unattached)、无所“坐落”，因而只是依附于“油屋”这个劳作世界、以薪酬换取存活手段的“自由劳动力”。

当然，成为汤婆婆并非没有好处。在宫崎骏的刻画下，汤婆婆的生活富足而奢靡，也很便利(convenience)。然而，获得便利的前提，首先是要有资本。不管是在奇幻世界中，还是在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世界中，拥有资本都是一种特别优势(privilege)。这就使得“成为汤婆婆”的路，事实上变得非常狭窄，不可能成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选项(option)。

不仅如此，即便对于那些因为拥有资本而有幸“成为汤婆婆”的人来说，这种生活也很难说堪称“美好”。我们发现，在宫崎骏的刻画下，汤婆婆屈从于逐利目标的裹挟，风里来雨里去，每天过着辛劳愁苦的生活，一点也不惬意。她虽然像哈林顿所说的那样，把理性灵魂简化到只剩下利益算计(calculation)的程度^①，能够从各种人际关系中尽一切可能盘剥好处，从每一个交易契机中发现利润增殖的办法。但是，这也恰恰意味着资本属性作为一种人格进入她的灵魂深处。越是精于算计，汤婆婆就越是对他人乃至自己冷酷无情，因而越是屈从于“物役”所带来的支配和束缚。越是精于算计，汤婆婆的激情系统就越是紊乱、越是非人化，以至于她对自己的孩子“坊宝宝”的情感充满病态。可见，就算有幸“成为汤婆婆”，一个人充其量也只能获得某种物质上的便利。但为这种物质便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属人幸福(human happiness)的可能性。^②

而对于“油屋”中那些没有资本、因而不可能成为汤婆婆的人来说，他们的路在哪里呢？回答似乎就是成为一个像“小玲”那样的“油屋”工人。可是，这个回答并没有触及根本。宫崎骏对此的思考极为复杂深沉。

二

宫崎骏自己在谈及创作意图时说，在一个“油屋”所象征的现代世界，被无名化、原子化以至

^① Cf.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62.

^② 宫崎骏对此的洞察，最好地体现在他对汤婆婆病态溺爱“坊宝宝”的刻画中。

于最终丧失自己牵绊和“坐落”的人，其实“别无选择，只能像一道微弱的光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像一个母鸡那样一刻不停地下蛋，直到最终被吃掉”^①。可见，“成为小玲”，只是一种非常表面化的处境。扎入根基处的，是一种丧失了成为“选择者”、因而“别无选择”的处境。“成为小玲”的实质，是“主体性”被缩窄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处境中的生活，犹如一道微弱的闪电，未经注意就划过了夜空。“选择”成为一个“别无选择”的人，这是“成为小玲”之路的最大悖论。

韦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曾说，物质财富曾是一件斗篷，而当现代资本主义完成它对社会秩序的整体建构后，这件斗篷就成了一个铁笼。^② 繁华“油屋”就是这样一个铁笼。它将汤婆婆和“小玲”们牢牢锚定在一个无法逃离的秩序结构中。但是，这个牢笼毕竟没有锁住一切。就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所说的那样，人是寻求理解的动物。当“油屋”中以资本逻辑搭建起来的秩序结构对人性实施异化时，当积累欲和占有欲在人类激情系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这种由资本逻辑所催生的新型人类激情系统，本身并不能回答“何谓美好生活”“人为什么要生活”这样的问题。因此，“油屋”中的生活，一如韦伯所说的现代性“铁笼”中的生活那样，的确是一种“专家没了精神、纵欲者失去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的生活，是一种人不可避免地其中丧失主观意义的生活。^③ 但是，一种扎根于人性之中、始终致力于寻求“主观意义”、寻求对属人生活的理解的精神之物，却逃逸（escape）出了这个“油屋”和“铁笼”。^④ 不幸在于，逃逸同时也意味着脱离（dissolution）。“油屋”固然是牢笼，但也是主体（现代个体以及现代世界本身）所在的地方。而一旦这种精神之物逃逸出“油屋”，它也就脱离了主体所在的领域，从此只能像个幽灵一般游荡在世界之外，在试图找回自己主体的旅程中，越来越丧失自己的面貌。

这个精神之物，在宫崎骏的刻画下（这也是整部作品最深刻的地方），就具象化为整部作品中最复杂难懂的角色“无脸人”。^⑤ 如果说“小玲”是“无脸人”的肉身，那么“无脸人”就是“小玲”的精神。“无脸人”不会说话、没有面庞、无法表达，是最彻底意义上的无言之人（speechless）。^⑥ 他游荡在以商业贸易和商品交换为运作方式的“油屋”世界之外，不被允许进入，但也无法被彻底驱赶。他时而透明、时而黝黑，貌似没有稳固的肉身躯壳，因而体现出某种空洞性

① Miyazaki Hayao, “Chihiro in a Strange World: The Aim of This Film”, p. 14.

②③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274—275页；第274—275页。

④ 有意思的是，韦伯恰恰也注意到，当现代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后，曾经助力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并为早期新教资本家提供主观意义的“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了铁笼”。韦伯惊问“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结局？”在这一点，我们认为宫崎骏的“无脸人”角色在追问现代性的病症和出路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思想成就。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75页。

⑤ “脸”与现代性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对“无脸人”的进一步思考，可与列维纳斯关于“脸”和“商业社会”的关系的思考相磋商。关于列维纳斯的相关论述，参见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三部分第二、三章。

⑥ 在阿伦特看来，“无言”是丧失自由的人（因而也是丧失人性的人）的最根本特征，因为一旦处于“无言”的状态，人就丧失了作为“行动者”的资格，无法再开展行动。参见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78—179、302—304。在某种意义上，宫崎骏也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创作意图时，他说“在这部电影中，我试图论述这样一个观点：言辞（words）是我们的意志、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力量所在。也正因此，我才会以日本为背景制作这样一部奇幻作品（fantasy）。”参见 Miyazaki Hayao, “Chihiro in a Strange World: The Aim of This Film”, p. 1。

(emptiness), 但依然充满属人生灵的激情和热望。^① 实际上, “无脸人”隐喻的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焦虑不安、寻求承认、充满怨恨、易怒而难以平静。这种精神气质普遍地存在于现代人的身上, 是一种 “当代灵魂 (a contemporary soul) ”。^②

作为属人生灵的激情和热望的必然表达, “无脸人”始终试图和自己的主体合一, 以填补自身的空洞。所以他不断对 “油屋” 造成冲击和干扰, 并因此被 “油屋” 小心地加以防范。直到千寻在突发的 “河神造访” 事件中善意地为他留下一道缝隙, “无脸人” 才第一次得以进入 “油屋”。进入 “油屋” 的 “无脸人” 不出所料地将 “油屋” 搅得天翻地覆。正是在对这场喧闹意外的刻画中, 宫崎骏表达了一些重要的见解。

进入 “油屋” 后, 虽然不断试图通过提供帮助来同千寻建立某种更加亲密的联系, 但总体而言, “无脸人” 并没有受到关心和注意。这就使 “无脸人” 渴求与主体相结合的属人热望无法得到满足。 “无脸人” 因而局促不安、不知所措。不过, 在 “河神造访” 事件中, “油屋” 中人意外地展现出一种 “集体性” 精神, 齐心协力地开展了一次 “集体救援” 行动, 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这场 “集体救援” 行动体现出了属人的共同生活的温暖感, 观众也容易被打动。但是, “无脸人” 像一位真正的哲人那样, 通过观摩这场 “集体救援”, 发现了现代世界中 “集体性” 的本质: 只有逐利动机和对钱的欲望, 才能带来这种表面团结和浅层一致。^③ 于是, 渴求被他人关注、与他人真正融合的 “无脸人”, 开始利用魔法制造金钱, 模仿起消费活动来。

“无脸人” 企图通过消费活动来找到自己的主体性。他成功地将一个在历经 “河神造访” 事件后已归于静谧的 “油屋” 再次变得热闹起来。 “无脸人” 不断变出金子, 使自己成了 “油屋” 这个商业之都的真正国王。但是, 随着消费活动步步升级, 一个残酷的事实也越来越清晰地摆到 “无脸人” 的面前: 金钱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爱、温暖和感动。当 “无脸人” 企图以消费活动为媒介来重建主观意义的努力达到顶点时, 他的愤怒和怨恨也达到了顶点。这种无以复加的愤怒和怨恨说明, 属人精神无法通过现代世界的消费活动找回自己的主体。金钱可以买到东西, 但不能使人幸福。 “无脸人” 失败了。

只有千寻能够帮助 “无脸人”。这既因为千寻是 “油屋” 中唯一不以金钱为生活目的的存在者 (她的目标是救回父母), 也因为只有她才握有河神所赠予的神药。经过两次努力, 千寻终于使

① “无脸人” 角色极其难懂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对它的理解必须召唤背景思想家和 “大书”。对动漫这样的经验素材开展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前提, 是要在素材、背景思想和 “大书” 之间建立某种 “三位一体” 关系。缺乏这样的 “三位一体” 关系, 就难免陷入对素材的主观化解读中。比如说, 一些研究者在没有任何分析和根据的情况下, 武断宣称 “无脸人” 是 “全球化” 的象征。参见渡边雅男 《〈千与千寻〉折射的〈资本论〉意蕴》, 李晓魁译,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 年第 7 期, 第 65—66 页。

② Susan Napier, “Matter out of Place: Carnival, Containment, and Cultural Recovery in Miyazaki’s ‘Spirited Away’”,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32 (2), Summer, 2006, p. 304.

③ 现代世界只能实现一种 “凑在一起过 (gathering together)” 的共同生活形式, 因而只能追求浅层一致性 (union), 而无法再像古代社会那样实现 “生活在一起 (living together)” 的共同生活形式, 无法达成真正一致性 (concord), 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早期现代以来的思想家。比如, 霍布斯认为, 现代世界如同雨后泥沼, 现代人如同从泥沼中钻出来的蘑菇, 过着彼此间不亏欠任何义务、但又不得不凑在一起的生活。参见 Thomas Hobbes, *On the Citiz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02。再比如, 卢梭特别强调了浅层一致性和真正一致性之间的区别, 试图通过某种社会改造方案, 重建具有真正一致性的社会生活。参见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0。而舍勒在痛斥怨恨和不信任造成现代人彼此之间的陌生和隔阂后, 不切实际地试图诉诸基督教 “团契” 的模式来重建 “生活在一起” 的形态。参见马克思·舍勒 《资本主义的未来》, 刘小枫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无脸人”的愤怒和怨恨得以平息。第一次，她试图向“无脸人”揭示某种伦理真相，告诉他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效果并不好。被纵欲与虚无捉弄得筋疲力尽的“无脸人”，已经丧失了洞察“好”与“坏”的能力，更遑论从“好”与“坏”的伦理真相中发现自我调节的规范力量。于是第二次，千寻将河神给的药的一半喂给了“无脸人”。经过“呕吐”这样一种极具隐喻意义的活动，“无脸人”终于平息下来。

在一个伦理真相已经无法发挥救助作用的地方，只有河神带来的药才能治疗（therapy）。成为“小玲”，在“油屋”世界做工，注定是一条令人绝望的路。在这条道路上，属人的精神或四处游荡，或陷入愤怒、怨恨和各种形式的疯狂之中，无法找到主体来安顿。治疗之方在“油屋”之外。宫崎骏自己否定了“油屋”本身作为出路的可能性。

三

第三条出路是“成为钱婆婆”。钱婆婆是汤婆婆的孪生姐妹。^①她生活在一个叫作“沼底”的乡村世界，生活简单，自给自足；既不役使人，也不受人役使。从“油屋”通往“沼底”的火车永远是单向的，有去无返。为了救助“无脸人”和“白龙”，千寻踏上了去往“沼底”的火车。在那趟火车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和“无脸人”一样黯淡无光、没有面容的生灵。他们来路不明，但归宿相同：乡村。其中的原因，在千寻勒令“无脸人”留在乡村时一语道破“那个地方会把你变坏的。”

很显然，在宫崎骏的见解中，“沼底”所代表的是某种“传统”生活形式，它属于乡村，属于作为乡村的传统。这种生活形式，是属人精神的真正安顿之所。只有留在那里，“无脸人”才不会“变坏”，属人精神才能保持它的天真和坦诚，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主体“坐落”，与生活重新合二为一。“乡村”滋养“精神”，“精神”捍卫“乡村”。

这个由宫崎骏通过动漫图像而深刻表达的人类生活理想，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的语境和文化背景。如果深入讨论，我们恐怕要召唤早期现代以来的所有伟大思想家。毕竟，从早期现代世界诞生以来，伴随着现代性及现代生活方式在全球地理空间上的逐步拓展，从欧洲大陆到大西洋两岸，一波又一波不断复苏的文化—精神“还乡梦（nostalgia）”都努力向我们呈现一个理想化的“乡村”生活样式。^②在这种“还乡梦”中，“乡村”所代表的始终是一种与“现代性”相对立的生活方式。“乡村”的最重要特点在于它被认为是唯一具有自我充分性（self-sufficiency）的生活样式。从古典时代起，这种自我充分性就被认为是真正的人类自由和人类美德（human virtue）的基础。因此，回到“乡村”，就是回到自由和美德最为充分的生活时刻。

然而，如果“成为钱婆婆”就是宫崎骏所希望的路，那么，与作品最后所表现出的那种莫名的乐观主义不同的是，在我们的见解中，这只是一条纸上的路，它缺乏现实性。我们的质疑是从宫崎骏自己对钱婆婆的乡村生活的刻画开始的。钱婆婆所生活的乡村，严格来讲其实是一个庄园。房子很大，设施简朴但不失整洁。考虑到钱婆婆是魔法世界的一员，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在庄园中生

① 一些研究者将钱婆婆和汤婆婆理解为是统一角色的两重人格。参见 Susan Napier, “Matter out of Place: Carnival, Containment, and Cultural Recovery in Miyazaki’s ‘Spirited Away’”, p. 308。如果是这样，那么《千与千寻》的复杂性将进一步增加，“乡村”和“油屋”的关系将不再像本文所说的构成对立和紧张的关系，而是“乡村”将成为一种“油屋”生活的治愈之所和诊疗之所。但就《千与千寻》的剧情来看，这种解读缺乏事实根据。

② 参见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特别是第14章；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特别是第12章。

活的钱婆婆，是否还是人类这样的有朽存在者，要经受无处不在的自然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y）束缚。比如说，我们不知道钱婆婆究竟要不要吃东西，要不要清理庄园的卫生等。因此，我们需要对此具体加以分析。

一方面，如果魔法能够足以使钱婆婆逃脱一切自然必然性的束缚，那么，钱婆婆的乡村生活就成了古典思想家所设想的真正“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如此一来，钱婆婆的魔法世界生活虽然美好，却因为无法成为一种人类经验（human experience），而在启发我们思考饱受现代性病症困扰的人类“美好生活”之道方面毫无建设性可言。

另一方面，如果钱婆婆像我们一样，仍然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束缚，魔法并不能免除克服自然必然性而不得不付出的辛劳愁苦，那么，在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形式的表象背后，我们要问，是什么支撑了这种生活？是什么将自然必然性注定带来的辛劳愁苦移出了生活的表象？在人类历史的古典世界中，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使用奴隶。我们不知道宫崎骏见解中的钱婆婆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回答，那么，对于大部分既没有机运成为“汤婆婆”，也没有机运成为“钱婆婆”的普通“油屋”工人来说，相比较钱婆婆的温情脉脉的乡村，汤婆婆的“油屋”起码实现了一种意义上的进步，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在成为商品的意义上，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对待。^①当千寻离开奇幻世界时，这个问题并不只是留在了“油屋”。在千寻父母的奥迪车所驶向的地方，它一样存在。

四

还有许多虽属细节但关涉重大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受篇幅的限制，我们的伦理探寻只能到此。那么，通过这场探寻，我们又获得了什么呢？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千与千寻》中那个神灵世界的灯，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灯一样，依然会再次点燃。外在于我们的东西，丝毫没有改变。除了看到三条出路无一可靠外，我们并没有发现传统与现代、商业资本与文化精神之间矛盾冲突的真正解决之道。所以我们不能假装存在某种解决之道。但我们并不泄气，因为正是经过这场探寻，我们领会到一项重要的伦理知识。它是有关少女英雄荻野千寻的，也对所有面临着同样处境的现代人有效。它告诉我们：在一个你无法改变的世界中，拾起勇气和决心，借助友谊和热忱，就会有希望。

这项知识会不会太过简单？并非如此。荻野千寻的成长并不轻松，她作出了惊人的努力和牺牲。我们的探寻也并不轻松，正是通过这场探寻，我们才对所身处的世界、对我们自己、对遭遇的他人，有了更深的理解。一次次这样的探寻之旅，最终将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使我们有信心在只有一次的“此生”中，选得好（choosing well）、做得好（doing well）、生活得好（living well）。这就是将动漫以及一切充满生活质地感（texture of life）的素材纳入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和前景所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冯瑞梅

^① 马克思关于人作为商品在现代资本主义环境下所实现的平等的经典评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4—205页。